

院内用书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之一

三个国际重要文献选编

赵 佐 良 选编

沈阳师范学院政教系

一九八一年五月

三个国际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八一年五月

目 录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 一、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 (1)
- 二、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实践中，从革命民
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4)
- 三、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的实践中，
批判地继承了人类优秀成果，
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18)
- 四、马克思、恩格斯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
级思想进行斗争中，
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 (29)
- 五、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伟大历史意义…………… (41)

第一国际重要文件、决议选编

- 一、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46)
- 二、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 (55)
- 三、第一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所有制》
的决议…………… (59)
- 四、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关于
《工人阶级的政治任务》的决议…………… (61)
- 五、第一国际《关于同盟的决议》…………… (62)

六、第一国际费城代表会议1876年7月15日的 通告·····	(63)
------------------------------------	--------

第二国际重要文件选编

一、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91年) 关于《工人 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的决议·····	(65)
二、伦敦代表大会 (1896年) 关于《工人阶级 的政治活动》的决议·····	(66)
三、巴黎代表大会 (1900年) 关于《夺取政权 和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的决议·····	(67)
四、盖德:《在巴黎代表大会上讨论夺取政权 问题时的演说》(1900年)·····	(68)
五、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 (1904年) 法国社会 党提出的、为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所否决的 决议案(草案); 殖民政策·····	(70)
六、斯图加特代表大会 (1907年) 关于《军国 主义和国际冲突》的决议·····	(72)
七、罗莎·卢森堡:《在斯图加特代表大 会“军国主义和国际政策”委员会上的发言》 (1907年)·····	(76)
八、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 (1912年) 关于《国 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的发言··	(78)
九、《法国社会党关于党员参加政府的宣言》 (1914年8月28日)·····	(84)
十、法国社会党人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和帝国战 争(摘自邦加勒回忆录)·····	(86)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重要文件选编

- 一、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书
(1919年1月24日) (88)
- 二、共产国际宣言（告全世界无产者）
(1919年3月6日) (94)
- 三、共产国际行动纲领(1919年3月4日)..... (107)
- 四、共产国际章程(1928年8月29日)..... (116)
- 五、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1920年8月6日）… (124)
- 六、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
(1935年8月1日) (131)
- 七、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节录）（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35年8月2日）…… (134)
- 八、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1943年5月15日）..... (149)
- 九、共产国际结束声明(1943年6月9日)..... (153)

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报刊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报告、文件和评论

- 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1943年5月26日) (155)
- 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关于共产国

际解散问题的报告（报导）	
（1943年5月26日）	（158）
三、论共产国际的解散	（163）
（《解放日报》社论，1943年5月28日）	
四、再论共产国际的解散	
（《解放日报》社论，1943年6月27日）	（168）
五、论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及其历史作用	（174）

附录：

一、十九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简介及其评价	
..... 赵佐良	（176）
二、有关布哈林的若干问题	郑异凡（204）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毛泽东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一、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

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的宪章派运动，达到了自己的最高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的地位。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协调和全民幸福的学说完全是撒谎。……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

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2—423页。

现在大家几乎都承认，现存的社会制度是由现在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创立的。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以来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资产阶级的一切美妙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可以自由发展了。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框框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象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实际地、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

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5—426页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民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0页

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

第263——264页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5页

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275页

二、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实践中，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做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时候，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消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

171
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讯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84页。

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生在特利尔。起初他在波恩和柏林研究法学，但不久就专门致力于研究历史和哲学，并且在1842年已经准备当哲学副教授讲授哲学了，然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死后所发生的政治运动，却使他终生转到了另一个方向在他的参加下，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等人，在科伦创办了《莱茵报》，由于马克思对莱茵省议会辩论的批评引起了极大的注意，1842年秋他被聘为该报的主笔。《莱茵报》的出版当然是经过检查的，但检查机关对它也没有办法。《莱茵

报》差不多总是能登载必要的文章；先是给检查官送一些次要的材料让他去删除，一直到他自行让步，或者在第二天出不了报纸的威胁下不得不让步为止。如果再有十种象《莱茵报》那样有勇气的报纸，而出版人又不惜额外花上几百塔勒排版费的话，那么德国的书报检查早在1843年就无法进行了。可是德国的报馆老板都是些卑微胆怯的庸人，所以《莱茵报》是孤军作战。它把检查官一个个都弄得一筹莫展。最后，对它规定了双重检查，在它受过第一次检查之后，行政区长官还要最后检查一次。但是这样也无济于事。1843年初，政府声称对这个报纸无可奈何，就干脆把它封闭了。

马克思（这时他已经同后来的反动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结婚）迁到了巴黎，在那里和阿·卢格一起开始出版《德法年鉴》，他在该刊物上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开端，陆续写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后来他和恩格斯共同出版了《神圣家族。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一书，这是针对当时德国哲学唯心主义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所作的讽刺性的批判。

马克思除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大革命史而外，还总是腾出时间利用适当机会抨击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对他进行了报复，1845年春天，它指使基佐内阁下令把马克思驱逐出法国。亚历山大·冯·洪堡先生大概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并于1847年和1848年在那里用法文先后发表了《哲学的贫困》一书，即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的批判，以及《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同时，他在布鲁塞尔创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从而开始了实际的鼓动工作。1847年他和他的政治上的朋友加入已

存在多年的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后，实际的鼓动工作对于他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了。同盟的全部组织这时已根本改造了；这个先前多少是密谋性的团体，现在变成了一个平常的、只是不得已才是秘密的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变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组织，凡是有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地方，就有这个同盟存在；英国、比利时、法国、瑞士几乎所有的工人协会的领导成员，以及德国很多工人协会的领导成员，都加入了同盟，同盟在初生的德国工人运动中尽的力量很大。同时我们的同盟第一个强调指出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并且在实际上证明了这点，——它的成员中有英国人、比利时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和其他国籍的人，并且还举行了（特别在伦敦）许多国际工人会议。

在1847年召开的两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进行了改组。第二次大会决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起草一篇宣言，把党的基本原则规定下来并公布于世。《共产党宣言》就是这样产生的，它第一次发表在1848年2月革命前不久，后来被译成欧洲几乎所有的文字。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35页。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

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是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作为这一切工作的完成——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别的什么也没有做，也可以拿这一成果引以自豪。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页。

……贪暴利的商业行为太可憎，巴门太可憎，浪费时间太可憎，还独做资产者，而是做工厂主，即做主动地向无产阶级进攻的资产者，特别可憎。我对于这种可憎的情形本已淡忘，自到父亲的工厂几天后，它又活现在我的眼前了。我自然也有打算，混迹商业中，只以自认适当为限，然后写一点违警的东西，以便能堂堂皇皇被驱逐出境，不过就是迁延到那时，我也挨不下去。如果不是为着每天必须从英国的社会中抽出最可憎的历史加入我的著作，相信自己已经迟钝了，可是这种工作至少使我的愤怒保持在沸腾之中。一个身为共产主义的人，如果不写作，还可因外面环境的关系，做资产者和盘剥重利的畜生，但要做广大的共产主义宣传，同时又要经营工商业，那真办不到。够了，复活节我离开这里。在一个彻底基督教的、普鲁士式的家庭中，过这种昏昏欲睡的生活——我再也忍受不了。长此以往，我可能变成一个德国式的庸人，并将这种庸俗气带到共产主义中来。

恩格斯：《致在巴黎的马克思》（巴门1845年1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第16页
工人们！

我献给你们一本书。在这本书里，我想把你们的状况、你们的苦难和斗争、你们的希望和要求的真实情况描绘给我的德国同胞们，我曾经在你们当中生活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对你们的状况有足够的了解。我非常认真地研究过你们的状况，研究过我所能弄到的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件，但是我并不以此为满足。我寻求的并不仅仅是和这个题目有关的抽象的知识，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政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做了。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高兴的是这样一来我在获得实际生活知识的过程中有成效地度过了许多时间，否则这些时间也只是在客厅里的闲谈和讨厌的礼节中消磨掉；骄傲的是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为这个受压迫受诽谤的阶级做一件应该做的事情，……还值得骄傲的是这样一来我就能保护英国人民，使他们不致日益受人鄙视。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3页。

我和本地的工人们曾经多次碰头，这就是说，和圣·安东尼郊外的家俱匠人的头脑多次碰头。此业匠人以自己特有的形态组织起起，除掉他们——经过和威特林派裁缝们的一种大斗争——十分纷乱的联合史外，这些人，就是说，他们中间约有十二至二十人每星期集会一次，向来是讨论问题的；但缺乏材料——绝不能有别的样子——亚威伯克必须对他们讲德国的历史——从远古起——讲一种极度纷乱的国民

经济学——讲人道主义的“德法年鉴”。在这期间，我参加了。我已两次和他们取得了联络，讲法国革命以来的德国状况，并从经济的状况出发。他们将这星期集会所学得的东西，于星期日在城门口的集会中传播出去。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巴黎1846年9月16日委员会书信第二号）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第38页。

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当我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了。

.....

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

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使德国无产阶级相信我们的信念是正确的。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以后，就立即着手工作了。我们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取得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该报一直到二月革命始终是我们的机关报。我们通过朱利安·哈尼同英国宪章派中的革命部分保持着联系，哈尼是宪章运动中央机关报《北极星报》的编辑，我是该报的撰稿人。我们也和布鲁塞尔的民主党人（马克思是民主协会副主席），以及《改革报》（我向该报提供关于英国和德国运动的报道）方面的法国社会民主党人结成了某种联盟关系。总之，我们同激进派的和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刊物的联系是再好也没有了。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193
页。

我们同正义者同盟的关系有如下述。存在这样一个同盟，我们当然是知道的，1843年沙佩尔建议我加入同盟，当时我自然拒绝了这个建议。但是，我们不仅同伦敦的盟员经常保持通讯联系，并且同巴黎各支部当时的领导人艾韦贝克医生有更为密切的交往。我们不参与同盟的内部事务，但仍然知道那里发生的一切重要事件。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口头、书信和报刊，影响着最杰出的盟员的理论观点。我们在问题涉及当时正在形成的共产党内部事务的特殊场合，向世界各地的朋友和通讯员分发各种石印通告，也是为了这个目